

汉语方言论集

黄家教 等著

漢
語
方
言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汉语方言论集

著 者（按文章排列次序）

黄家教 詹伯慧 陈世民 李如龙 陈章太

张盛裕 王福堂 施文涛 许宝华

[美] 余霭芹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论集/黄家敦等编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3

ISBN 7-5619-0486-X

I. 汉…

II. 黄…

III. 汉语方言—方言研究—文集

IV. H17-53

责任印制:汪学发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彩插:2

字数:224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16.00 元

鹭江结识



一九六三年八月，应邀参加福建方言讨论会而结识的几个道友，会后合摄于厦门大学南普陀风景区。前排左起黄家教，陈世民，詹伯慧，陈章太，许宝华；后排左起，施文涛，张盛裕，王福堂，李如龙。

京 华 欢 聚



一九八二年八月，在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期间，合摄于北京友谊宾馆庭园。右起黄家教，詹伯慧，陈章太，许宝华，张盛裕，王福堂，李如龙。

羊城再会



一九九四年五月，参加广州暨南大学现代汉语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在中山大学校园合影。左起黄家教，詹伯慧，陈章太，许宝华，张盛裕，王福堂，李如龙。

前 言

一九九一年二月，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九六三年被邀到厦门参加福建方言讨论会而结识的几个道友，建议一九九三年再次聚会厦门，讨论三十年来研究汉语方言的心得体会，会后争取出本论文集。如今会已经开过了，论文集也编好了，道友们要我写个《前言》，我就把两次聚会的经过略为陈述，以志不忘。

当我写那封信时，想到春节过后，章太将东渡扶桑，过两年讲学期满归国时，已是一九九三年了。这正好是诸同道结识三十周年，值得记念。

忆一九六三年夏天，诸友欢聚鹭江，讨论福建方言研究成果，纵谈各自参加方言普查的甘苦，交换方言课教学的意见，莫不从中得到启迪，展望汉语方言研究前景，可谓雄心勃勃。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诸友于语言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尤其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创获良多，称得上是尽力而为。

三十年前的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或准老年人了。今后老少仍须齐努力。六十以下的自然是寄希望之所在。希望在一九九三年再次聚首鹭江，以博畅叙之快。每人带论文两篇（论著或译作均可），共同研讨。过后争取出一个集子，以志以文会友之雅兴。

继章太之后，宝华也应邀到日本讲学，约期一年，计一九九四年才能归来。如龙也于一九九三年到香港访问。到一九九四年春，伯慧和如龙已先后从武汉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调到广州暨南大学，伯慧所带的首批方言学博士生举行论文答辩，正好定于一

九九四年五月在广州举行。暨南大学邀请陈章太、王福堂、张盛裕、许宝华，参与这次博士生论文答辩，我们也就把拟议中的厦门再次聚会，改为一九九四年五月在广州举行。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全国各省都开展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福建省在这方面的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其成果表现在铅印的一百多万字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上面。福建方言普查指导组一九六三年八月于厦门召开福建方言研讨会，邀请了北京的陈章太、张盛裕、王福堂，上海的许宝华，南京的施文涛，武汉的詹伯慧，广州的黄家教出席。会上讨论了从莆田、仙游话的归属问题到汉语方言的谱系问题，讨论十分热烈。会后黄家教、詹伯慧、陈世民把三人在会上的发言，综合写成了《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此文刊于《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六三年第四期。这样的合作在往后的岁月里还有令人满意的发展。詹伯慧、李如龙、黄家教、许宝华合写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陈章太、李如龙合写的《闽语研究》，都是有一定水平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在八十年代，陈章太、李如龙、詹伯慧、王福堂、许宝华和黄家教等还为举办建瓯、泰宁两个全国性方言调查讲习班而合作。

回顾三十二年前厦门聚会，其情景似在眼前。记得会后游厦门南普陀，有带摄影机者要为大家拍照留念，一群人哄哄然怎么排列呢？有人提议自报岁数，然后站队。果然井然有序。黄家教年纪最大，排第一，依次有陈世民、詹伯慧、陈章太、许宝华、施文涛、张盛裕、王福堂、李如龙。大家戏称家教为老大，如龙岂不成为老九了么！现将九人合影的像片一并刊出，作为纪念，尤其要怀念施文涛，他当时还不满三十岁，而发表的文章，如春蕊怒放。惜英华早谢！

如今把九人带来的论文，每人两篇，组成一个集子，只盼在汉语方言研究的道路上，能留下几个脚印。正是由于这个“留脚印”的目的，所选论文大都是曾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为了

如实反映当时的看法和观点，文章都一仍其旧，不作修改。

一九九五年二月黄家教草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

.....	黄家教	詹伯慧	陈世民	(1)
四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回顾	詹伯慧			(21)
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李如龙			(38)
北方话词汇的初步考察	陈章太			(53)
河西走廊的汉语方言	张盛裕			(65)
杭州方言上声字中声母 V、Z 的音变	王福堂			(85)
宁波方言本字考	施文涛			(95)
太平(仙源)方言叹词记略	张盛裕			(114)
邵武方言的入声	陈章太			(122)
珠江三角洲方音说略	詹伯慧			(128)
从“等”来看广州方言入声消失的迹象	黄家教			(151)
福建方言声调分化的模式	李如龙			(161)
闽北方言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	王福堂			(179)
从历史音韵出发来考察汉语方言语音的差异	黄家教			(185)
论入声	许宝华			(199)
中古全浊声母在现代方言里的演变	许宝华			(223)
略论地方志里方言资料的作用问题	施文涛			(232)
语法演变中的词汇				
——汉语语法的词汇扩散				
.....	[美国] 余霭芹著	陈世民译		(249)

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

黄家教 詹伯慧 陈世民

—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我国语言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丰富多采的地方方言是汉语的特点之一。任何一个认真研究汉语的人，都不可能不接触到汉语方言的问题。无论是静态地描写汉语，或者是历史地揭示汉语的发展规律，如果不参考汉语方言的材料，是很难获得完满的成果的。咱们现在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既要看到它在今天的作用，也要看到它在明天的作用；既要认识到它在语言学研究中的战术意义，也要认识到它在语言学研究中的战略意义。

我国汉语方言的研究工作，虽然已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可是，第一次全面展开汉语方言的普查，却还是几年以前的事。在1956—1958年间，为了促进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开展，替汉字改革铺平道路，并为汉语规范化工作提供科学资料，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各地党、政、文教部门的具体领导下，胜利地开展了以每县为

* 1963年8月12日至17日，我们应邀参加了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福建省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这一个会议把讨论方言分区问题作为中心的课题，讨论涉及方言分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也涉及许多实际问题。本文是在我们参加讨论会发言稿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而成的。

一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从而积累了空前丰富的方言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各省（自治区）着手编写了一些概括全省（自治区）汉语方言面貌的《××省（自治区）汉语方言概况》。这样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给我国语言科学宝库增添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在方言工作者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像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妥善地加以解决，对于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汉语方言，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想趁这个机会结合在福建省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中得到的一些启发以及自己过去在工作中的点滴体会，把我们对于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提出来，向专家们和读者们请教。

二

众所周知，汉语是世界上方言分歧比较大的语言之一。以汉语这样一个拥有将近六亿人口，分布在纵横几千公里土地上的语言，方言比较复杂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方言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咱们作为语言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现实，把各种方言的庐山真面目揭示出来，让人们知道汉语方言究竟分歧到什么程度；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性表现在哪些地方；除了差异性以外，是不是还有一致性的一面；还有，汉语各方言实际流通的情况如何；等等。如果咱们试图解答这样一些问题，必然就会接触到如何把各具特色、头绪纷繁的许多方言归纳成为为数有限的若干类别的问题，即如何划分汉语方言的问题了。比方说，当我们在调查广东省内各地的汉语方言的时候，我们接触到大量的语言事实，我们发现粤东潮汕一带的地方话，海南岛汉族地区的地方话，以及粤东梅县兴宁一带的地方话，都分别跟广州一带的地方话迥然不同，这时咱们就不能不在脑子里产生如何给这些不同的

地方话归类的问题；同样，当咱们在调查福建省内各地汉语方言的时候，咱们发现闽南厦门一带的地方话跟闽东福州一带的地方话，跟闽北建瓯一带的地方话，跟闽中永安一带的地方话都有差别，而闽西长汀一带的地方话和闽西北邵武一带的地方话又跟福州、厦门、建瓯、永安等地的地方话有更大的距离，咱们也就不能不考虑到：福建省内这许多互不相同的地方话究竟应该归属于几个类别呢？如何给它们作科学的分类呢？这样的考虑是很自然的，也是很现实的，科学的方言分区能够使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到每一种地方话在整个汉语方言大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跟哪些地方话是“近亲”，又跟哪些地方话是“远戚”。一句话，科学的分区能使各地人民清楚地了解自己方言的系属。同时，从语言研究的需要来说，科学的方言分区还会有利于咱们掌握各地方言的特点，从而因势利导地促使各地方言向共同语集中，早日实现汉语规范化这一伟大理想。由此看来，汉语方言的分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任何一个认真严肃的方言工作者都必须深思熟虑的事情。

汉语方言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方言之间有着“近亲”和“远戚”的不同关系，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实际上只是把客观存在的方言系属如实地归纳出来，并加以科学的说明。这首先就要求任何一个方言工作者在给方言分区时，必须大量占有可以作为分区依据的材料，然后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运用这些材料，以达到分区的目的。我们认为，无论在哪个省（自治区）里接触到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都必须首先确立面对客观事实，不拘泥于传统看法的指导思想，否则是难以得到满意的结果的。

三

分区要面对事实，所谓事实指的是什么呢？方言分区应该以什么为依据呢？关于这个问题，在这次福建省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上曾经有过热烈的争论。总的说来，我们是基本上同意《福建汉语方言概况》编写小组“以语言材料为依据，而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的提法的。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分支，它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而方言的分区只能是“语言”本身的分区，只能以语言材料作为主要的最终的依据。离开了语言材料，而以其他材料（如地理条件等等）作为分区的主要依据，就必然会牵强附会，歪曲事实，无法确保分区的科学性。但是另一方面，方言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跟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都可以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找到一定的依据。要为方言合理分区，既要了解它的现状，又要了解它的历史，同时，要彻底地了解现状，也只有从历史上进行考察才有可能。方言区人文历史方面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探索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而在划分方言时应该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我们在为方言分区时，如果能在以语言材料为主要依据的前提下，适当地参考人文历史方面的材料，就能更好地弄清方言分区的实质。事实上，客观存在的不同方言区，正是一方面在语言材料上有显著的差别，另一方面在人文历史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因素。可是，在贯彻这一原则的时候，如何做到既正确地运用了语言材料所提供的依据而又同时没有忽略结合人文历史方面的情况来考虑，使两方面的配合运用恰到好处，使之相辅相成，达到辩证的统一，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咱们给汉语方言分区的结果，总得让人们既能够在不同的方言区中看到它们明显的语言标志，必要时也能够从人文历史方面

看到这个方言所以自成一区的依据才好。过去几十年我国语言学界曾经不止一次试图给汉语方言作合理的分区，先后有过不少的改进，可是，至今咱们还难以完满地回答出汉语究竟有多少种方言，多少种次方言，多少种土语来。在一些影响较大的汉语著作中，对于汉语的方言分区，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过去对汉语方言缺乏全面的调查研究，无法充分做到“以语言材料为依据”；另一方面，过去对于决定方言分区的问题应该联系方言的历史，联系使用方言的人民的歷史，联系跟方言的形成、发展有关的各方面的人文资料，这一点或是没有引起重视，或是体会不够深刻，因而实际运用起来往往无法兼顾，恐怕也是造成分区问题迟迟未决的原因之一。如果咱们能够双管齐下，从语言材料和人文历史方面加以全面考虑，如今有了全国汉语方言普查的基础，分区的问题应该是不难迎刃而解的。最低限度咱们应该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汉语究竟分成几个大方言区”这个问题求得一个比之前人的结论较为妥贴的答案来。

不妨让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几十年来汉语方言分区的情况：最早给现代汉语分类的要算是章太炎了。他在《检论·方言篇》中把汉语方言分为九种，他划分时常凭印象，方言面貌的描写和解释极不科学。例如说什么“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滨海下湿，而内多渠浍湖沼，故声濡弱。”像这样用自然地理的条件来解释方言的差异，可以说还没有超出一千三百多年前颜之推的水平。^①随后黎锦熙先生曾依江湖流域的分布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二系，也还是缺乏科学的根据，方言的划分仍然没有被提到以语言材料为依据的高度上来^②。后来王力先生在他的《中国语文讲话》中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和客家话五大系，可以说是注意到语言的材料，而不是纯粹依照地理区域来划分了^③。可是，由于当时王先生还不可能接触到大量的汉语方言材料，对于人文历史方面材

料的掌握和利用也远远不够，五大方言说尽管比章氏的九种说和黎氏的十二系说科学得多，但距离妥贴的要求还是相当远的。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语言学界是习惯于暂用五大方言说的。随着语言科学水平的发展，后来人们在语言实践中终于逐渐发现五大方言不能概括汉语方言的全貌，首先是感到把湘方言和赣方言都笼统归到“官话”中不符合客观语言事实，因此，就有人认为应让湘、赣两方言各自独立成系，这样一来，五大方言说就开始动摇了。与此同时，还有人觉得福建省内方言异常复杂、闽南闽北无法通话，“闽语”的提法过于笼统，因而又有闽南闽北分立两区的说法，最后导致了八大方言取代五大方言的新局面。八大方言就是北方方言（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自从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李荣两位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汉语方言调查》的学术报告，正式提出汉语方言可以分为八区，并列举各区语音特点以后^①，七八年来我国许多汉语方面的著作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大家无形中已经默认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妥善的汉语方言分区了。

然而，当咱们今天站在汉语方言普查告一段落，方言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都有所长进的基础上，再来重新估价一下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提法时，面对着语言材料和人文历史情况，咱们就难免会感到五大方言说固然嫌太笼统，就是八大方言说，也还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了。从五区到八区，在反映客观语言事实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这样的处理在某些地方多少却令人感到过于强调语言的现状而放松了对于语言历史和人文历史方面的注意，过于强调方言之间差异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一致性的一面。比如把闽方言分列为闽南闽北两区这一点，根据近几年福建方言普查的材料来看，是很难说得通的：第一，福建省闽方言区内不但闽南闽北无法通话，闽东、闽中同样无法与闽南、闽北通话；第

二，福州位于闽东，福州话在闽北不能通行，它只能作为闽东的代表，真正代表闽北的应该是建瓯话。由此可见，如果单纯从语言现状出发，强调其差异性的一面，那就不但闽南闽北可以并列为两大方言，闽东、闽中同样也可以并列为汉语的两大方言了。我们在给整个汉语划分为若干大方言区的时候，当然应该从大处着眼，而不宜过分注意表面的语言因素的分歧。须知汉语有悠久的历史，汉语方言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分歧状况绝不是偶然的，我们一定要密切联系历史，密切注意共同的因素，一致的东西，尽管表面上分歧很大，各个方言之间必然会有其共同的基础，以显示汉语作为一个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对待表现在各地方话中的种种差异，咱们既要实事求是地充分揭示真相，又要在千差万别中找出可以作为概括、分类的一致性的因素。只有同中察异、异中明同，才能够从复杂的方言现象中整理出一个简明贴切的汉语方言系统来。否则不但闽方言不能归成一类，就是其它各大方言，也难保不分崩离析，整个汉语的方言，怕不是十区八区所能概括，或许得分成几十个区了。拿大家都公认的“官话区”（北方方言）来说，它的使用人口近四亿人，分布地域占汉语地区四分之三，我们如果不是从大处着眼，实在是难以设想其统一性何在的。要是斤斤计较个别语言因素的话，西安话怎能跟武汉话归到一个大方言区中，扬州话又怎能跟哈尔滨话攀上亲戚呢？近年来各省（自治区）在编写《方言概况》中都或多或少碰到划分方言区、确定方言系属的难题。例如《广西汉语方言概要》指出广西的“平话应该独立抑或应该属入现有的八大方言中的哪一种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湖北方言概况》把湖北全省汉语方言分为三区，其中除了以武汉话为代表的的一个区在全国汉语方言中的系属明确以外（属北方方言区中的西南方言系统），其余两个区（“楚语区”和“鄂南区”）的系属就都没有明确指出。《湖南省汉语方言总结报告》把湖南方言分为三区，其中第一区属湘方言，第